

立委選制改變對指定用途 補助款分配之影響： 第五屆與第六屆的比較*

賴映潔** 王宏文***

- 一、前言
-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設
-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 四、研究結果
- 五、結論

2005 年我國將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由「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選票制」改為「單一選區制兩票制」，同時重新劃分選區，並確定於 2008 年選舉第七屆立法委員時開始實施。第六屆立委及政

* 筆者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所提出的寶貴建議，使本文更加完善，若本文有任何疏漏之處，乃是筆者之責任。

** 台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政風室科員，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E-mail: 730248@gmail.com

***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E-mail: hongwung@ntu.edu.tw

投稿日期：2011 年 12 月 27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3 年 4 月 20 日。

東吳政治學報/2013/第三十一卷第一期/頁 53-104。

黨領袖在面臨新選制及新選區，並為了最大化其連任機率和最大化政黨席次，他們會如何改變指定用途補助之分配行為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在第五屆及第六屆立委任期內分配至各選區的補助金額為分析對象，從選區個人及政黨選票集中度的角度切入，研究結果顯示選區立委個人選票集中度越高者，該選區所獲得的人均補助款也較多，這可能是因為有立委在該選區較具優勢，因此選民對立委有較高的期待、監督、與課責，使立委爭取肉桶之動機較強，本研究也發現立委個人選票集中度較高的選區，第六屆會比第五屆獲得更多的補助款。此外，選區政黨選票集中度對第五屆立委任期內之補助款分配的影響很小，且不顯著；但對第六屆立委任期內之補助款分配則具有顯著的影響，甚至超越個人選票集中度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政治人物已預期到政黨競爭將是第七屆立委選舉的主要面向，且希望以補助款的分配來鞏固政黨既有的地盤。

關鍵詞：分配政策、指定用途補助款、立委選制改革、城鄉新風貌計畫、赫芬達爾指數

一、前言

2005年6月我國國民代表大會通過第七次修憲案，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由「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選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under multi-member district system，以下稱SNTV制)改為「單一選區制兩票制」(single-district, two vote system，以下稱單一選區制)，且立委總席次數減半，由225名減為113名。同年8月，中央選舉委員會通過「第七屆立法委員直轄市、縣市選舉區劃分原則」，將原本大致以縣市為界的29個選區(以下稱舊選區)，重劃為以次級行政區組合為界的73個選區(以下稱新選區)。2006年5月19日確認新選制下的選區劃分，並將從第七屆立委選舉時開始實施。

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改變為單一選區制之後，會有一些可能的效果，首先，Lancaster (1986)認為在單一選區制度之下，因為選民對議員課責性較高，所以議員會積極將政策利益，如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補助，帶回選區內，即立委的肉桶立法動機較強；反之，在SNTV制度下，選區議員人數較多，容易產生集體行動之困難，且選民課責性較低，因此肉桶立法動機較低。但也有學者認為在複數選區制度下，議員可能會因黨內競爭，爭取個人選票(personal voting)，而導致肉桶立法動機增強(Snyder and Ueda, 2007)。因此我國立法委員選制改變後，究竟立委的肉桶立法行為會如何改變是一個實證問題。

其次，第六屆立委任期內的選制改變勢必會影響第六屆立委及國會內政黨領袖的行為，因為若第六屆立委以最大化其連任機率為

目標，¹ 則當連任的遊戲規則改變時，討好選民的策略勢必要改變，但肉桶要怎麼分配才能使選票極大化？甚至如何使政黨在下屆選舉中獲得之席次最大化，將是立委及政黨領袖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因此，立委及政黨領袖在選舉制度改變下的預期心理，會引發其行為做什麼樣的改變，將是本研究關注焦點。

前述兩種推論皆有待實證研究來回答，我國學者羅清俊、廖健良（2009）以立委提案數作為觀察的重點，研究結果顯示第六屆立法委員的提案行為會因新選制而改變，中、大選區所選出的第六屆立委提案數的增加幅度明顯大於小選區所選出的立委。但因他們所觀察的重點為立委的提案行為，而非能落實到選區內的實質金額，羅清俊（2009）則以各縣市所獲得的「擴大公共建設振興經濟暫行條例」之分配金額及補助款之分配金額為研究對象，探討選區規模及選區選票集中度對選區獲得補助金額的影響，但因其所使用之選區選票集中度指標有改善的空間，因此本研究從選票集中度的角度切入，來分析其對選區獲得補助金額之影響，來填補此一研究空隙，使台灣有關分配政治的實證研究更加完善。

本文以補助金額為觀察重點，主要的研究問題如下：第一、第五屆及第六屆立委任期內，哪些因素會影響立委之內桶行為？第二、選票集中度對於選區獲得補助金額之影響為何？此外，因新的選制將在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中實施，在面臨的選制不同下，第六

1. 在第六屆立委選舉中，有 135 位第五屆現任立委投入選戰，占 168 名選區立委 81.5%，尋求連任率達八成（羅清俊、廖健良，2009）；在第七屆立委選舉中，有 122 位第六屆現任立委登記黨內初選以及投入立委選戰，占 168 名選區立委 72.6%，尋求連任率達七成。第六屆的連任意圖指標採登記黨內初選，亦即現任立委登記黨內初選占現任立委人數之比例。然國民黨並未公佈登記黨內初選名單之資料，因此國民黨方面的計算採投入立委選戰人數（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2011；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2011；民主進步黨全球資訊網，2011）。

屆立委的肉桶行為與第五屆是否會有明顯差異？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設

(一) 文獻回顧

分配理論 (distributive theory) 旨在探討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之補助利益，如何透過國會制度性決定作地域性分配，成為分配政策 (distributive policy)。分配政策概念的出現首推 Theodore J. Lowi 於 1964 年提出政策分類理論，將公共政策依照利益得失者、政治行動者及其組織方式等分為分配政策、管制政策、重分配政策三種類型。分配政策本質在於可以不斷切割成更細小單位，每一份單位各自獨立。政策利益由少數人獲得，而政策成本由大多數人負擔 (Lowi, 1964)。

Rundquist and Ferejohn (1975) 接續 Lowi 分配政策的概念，將分配政策的政治行動者焦點放在國會委員會提出三項假設，第一、甄補假設 (recruitment hypothesis)：來自具有特殊利益選區的國會議員，會尋求進入與其選區利益相關的委員會以及撥款次委員會；第二、過度代表假設 (overrepresentation hypothesis)：該委員會議員的選區比起非該委員會其他議員的選區，在該委員會所代表的議題上，有過度代表的現象；第三、利益假設 (benefit hypothesis)：相較於其他國會議員，該委員會成員議員的選區會獲得不成比例地較多經費，此三假設又稱為分配理論 (distributive theory)。他們以美國軍隊採購 (military procurement) 以及工兵土木工程 (corps of engineers civil works) 作實證研究，雖然實證結果並未完全支持假設，但也引起許多學者關注影響分配政策的因素。

分配理論的提出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他們進一步探討哪些因素會影響分配政策，例如有學者發現委員會的成員可以將該委員會可以主導之計畫支出多分配至他們的選區內（Plott, 1968; Alvarez and Saving, 1997），議員資深度或在某委員會內的議員資深程度也會影響該委員會可審議預算的分配（Roberts, 1990; Stroup, 1998），此外，若州長的黨籍與總統相同，則該州會收到較多的補助款（Larcinese et al., 2006），若該州的國會議員中，多數是與總統同政黨，則該州也會收到較多的補助款或政策利益（黃紀、林怡均，2009；李俊達，2010）。

但也有研究指出補助款會依照客觀的指標，如人口數、所得狀況、或自有財源比率，做公平的分配（Anagoston, 1980; Lazarus, 2010；蘇彩足，2001），此外，選舉的激烈程度也會影響補助款的分配（羅清俊、萬榮水，1999）。

有學者特別關注選舉制度對分配政策的影響，自從 Lancaster（1986）提出在單一選區制度下的議員會有較高的肉桶立法動機的推論後，許多學者從事實證研究來驗證其假說，基本上可以分為三種結果。

首先，有些研究的發現符合 Lancaster（1986）的推論（Cain et al., 1979; Scholl, 1986; Lancaster and Patterson, 1990; Stratmann and Baur, 2002; Heitshusen et al., 2005; 羅清俊、廖健良，2009）。例如 Scholl（1986）針對由單一選制產生的 14 位英國歐洲議會議員，與由比例代表制產生的 12 位法國議員，進行問卷調查及訪談。研究結果顯示，訪談中的 14 位英國議員全數認為服務選區利益是重要的，法國議員則有 64%認為重要；92%英國議員會向選民邀功自己為選區拿得補助款；67%法國議員會如此作；英國議員不論在提案或爭

取補助款上都較法國議員積極。

Lancaster and Patterson (1990) 則對採行聯立制的德國 498 位聯邦議會議員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 37.9% 單一選區制議員認為肉桶立法高度重要，比複數選區制議員多出 17%，它們的研究發現都符合 Lancaster (1986) 的推論。

但也有學者的研究結果與 Lancaster (1986) 的推論不同，如 Snyder and Ueda (2007) 不同意選區規模越小，肉桶立法動機越大的邏輯，他們質疑集體行動問題對複數選區制議員肉桶立法是否有如此大的影響。他們以 1970 至 1980 年代州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補助款作為觀察重點，分析結果顯示施行複數選區制的郡或城市獲得較多州政府補助款；且選區規模越大，即選區應選名額越多，會獲得較多州政府補助款。因此，他們認為州議員選制轉變為單一選區制後，議員會因公共財外溢效果以及選區議員抵制投票效果，降低議員肉桶立法之效率。

不過，也有研究發現選制改變並不會導致選民投票行為改變。Hirano (2005) 研究日本選制變遷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發現選民投票行為並未因選制由複數選區制轉變為單一選區制，而從原本候選人中心以及關心地方議題轉變為政黨中心以及關心全國性議題。原因在於日本政黨合併與分裂迅速，民眾幾乎無法辨識個別政黨的意識形態與理念，因此選民投票行為依舊是以候選人為中心。

國內對選舉制度對分配政治影響的相關研究，主要是探討選民對議員肉桶立法的期待及議員肉桶立法行為。羅清俊 (2008) 調查 SNTV 時期選民對立委肉桶立法的期待與評價，研究發現小規模選區選民比中、大選區選民更期待肉桶立法，此結果證實 Lancaster (1986) 的推論，他並依據 Lancaster (1986) 的推論，認為選制改

變後，由單一選區制選出的區域立委，肉桶立法行為應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趨勢。

羅清俊、廖健良（2009）則檢視在立法委員選制改變前夕，立委是否為了連任而改變其立法行為。其以第五屆、第六屆區域立委提案數為觀察重點，結果發現不論是第五屆或第六屆，選區規模越大，立委提案數量較少；就兩屆比較而言，小選區的第六屆立委提案增加量並不明顯，中、大選區第六屆立委的提案數則有明顯增長；此外，個人的選票集中程度越高，則該立委的肉桶提案數也越高。

羅清俊（2009）也發現選區越小，選區所獲得的人均補助款會越多，但選區內立委選票集中程度越高，則該選區所獲得的補助款金額會越小，這與羅清俊、廖健良（2009）的研究結果不同，筆者認為會造成如此的矛盾的結果有二：

第一，兩個研究的選票集中程度的衡量方式不同。羅清俊、廖健良（2009）所定義的是每一位立委個人的選票集中度，他們首先定義每一位立委的票倉區指數，這是一個類似 Ames（1995）所使用的指標，羅清俊在修正後，才定義每一立委選票集中指數為每一立委在各鄉鎮市或行政區之票倉區指數的標準差，標準差越大，則代表選票集中指數越高。

羅清俊（2009）所定義的則是以縣市為分析單位之立委選票集中度，對於立委人數超過一位的縣市，羅清俊定義縣市的選票集中度為這些立委個人選票集中度之平均數，這樣平均的方法是假設每一位立委的選票集中度對於選區所獲得補助金額是一樣重要的，但若某縣市中有一位立委的選票集中在某一鄉鎮市，而其他立委的選票較平均時，此選票集中之立委應有很強的動機進行肉桶法案，縣市內其他立委也不會妨礙他去爭取肉桶，以免被選區之選民討厭。

因此羅清俊（2009）定義選區選票集中度的方法並沒有其他文獻支持，此外使用簡單平均的方法並未給與選票集中度較高者較大的權重，因此其選區選票集中度指數的衡量方式是有改善空間的。

因兩篇文章所定義之選票集中度不同的情況下，其研究結果也就不具可比性，但羅清俊（2009）所使用之縣市立委選票集中程度的衡量方式似有改進的空間。

第二，羅清俊、廖健良（2009）與羅清俊（2009）之研究中並未區分單一席次選區與複數席次選區，就理論上說，單一席次選區中立委與複數席次選區中立委的分配行為並不太相同，因此在實證研究上，也應該區分為兩種樣本，但在上述研究中，他們並未針對複數席次選區來做研究，是一缺憾。

本文與上述兩篇論文不同之處在於筆者改進選票集中度的衡量方式，並在實證研究上區分了單一席次選區與複數席次選區的樣本。首先，在選票集中度的衡量上，筆者認為應以每一位立委個人的選票為基礎來衡量選區的選票集中度，因此羅清俊、廖健良（2009）的衡量方式是較佳的，他們使用每一位立委在各行政區之票倉指數的標準差為衡量方式，其計算的方式較為繁複，不是很直接。因此筆者提出以 Herfindahl Index（HI）來衡量選區政治勢力集中度，HI 是經濟學上常用來測量產業市場集中度的指標，當 HI 值越大，表示市場集中程度越高，大企業壟斷程度越高，是一個比較符合直覺的指標。其次，本文在樣本上也區分了單一席次選區與複數選區的樣本，以檢測模型的有效性。

(二) 理論假設

就實際運作來看，台灣 SNTV 的選區可以區分為單一席次選區與複數席次選區兩種，單一席次選區為應選名額為一名的選區（如台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等四個選區），複數席次選區則是應選名額大於一名的選區。因單一席次選區的應選立法委員為一名，因此選民很容易對其表現課責，其實際運作狀況有如單一選區制，因此依照 Lancaster（1986）的推論，單一席次選區之立委比複數席次選區之立委有較強烈之肉桶立法動機。因此本文的第一個假設為：

假設一：單一席次選區獲得的人均補助款會比複數席次選區者多。

其次，針對複數席次選區，Lancaster（1986）並未有直接的著墨，但針對指定用途補助款（*earmarks, earmarked projects*）的重要性，學者們做了許多的研究，最重要的是想了解分配給議員的補助款是否真的能幫助議員在下次選舉中獲勝？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補助款對議員在下次選舉中的得票率並沒有顯著的影響（Fiorina, 1981），但學者指出指定用途的補助款仍是非常重要的，² 主要有三個原因：

首先是一般補助款資訊的不透明，使得眾議員更需爭取指定用

2. Lee（2003）提到指定用途補助款通常只占政府預算中非常小的比例，大約是占非國防預算中的 0.1%，但聯邦政府給與一般補助則占了約 22%，大多數的一般補助款的分配乃是依據一定的公式來計算，如同台灣目前的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等，因此受到國會議員的政治影響較少。同理可知，相對於統籌分配稅款或一般補助款，立委對於指定用途補助款的分配較具影響力。因此在分配政治的實證研究上，Lee（2003）主張應以指定用途補助款作為研究的對象，才比較能看出國會議員的影響力。

途的補助 (Lee, 2003)。因為眾議員選區並非是一個州或是一個郡，而是涵蓋數個郡，加上聯邦政府在公布補助款分配的資訊時多以州為單位，使得眾議員選區與州的轄區在地理範圍上並不一致，使一般選民難以得知現任的眾議員究竟替該選區的選民帶回多少的補助款，在資訊不很透明的情況下，一般性補助款的增加很難轉換成選票的增加，因此議員們希望能多爭取一些指定用途補助款在他們的選區之內，這樣將可以滿足選民的需求，特別是該選區中注意議員行為的選民或團體 (attentive voters) 的需求 (Stein and Bickers, 1994; Bickers and Stein, 1996; Lowry and Potoski, 2004)，例如地方政府首長及議員、地方企業、或是專業的組織等，會注意議員究竟能否多帶回牛肉以滿足他們的期待。³

這樣的情況在台灣的第五屆及第六屆立委也是適用的，因為一般民眾並不是很清楚立法委員為該選區到底爭取到多少的補助款，但關心政治的民眾或團體則會詳查他們的行為及功績，因此立委仍想多爭取指定用途的補助。

第二個原因是比較容易邀功 (Lee, 2003)。眾議員在爭取到補助款後，需要向選民傳遞這項訊息，使選民對現任眾議員有好的印象，但州長常常也會進行同樣的事情，來向選民邀功，特別是州長具有分配一般補助款的權力，因此眾議員並沒有把握這個爭取到的一般性補助款一定會分配多少數額至他的選區中，即使分配到他的選區中，州長也可以宣稱是他所分配的，因此眾議員就較不容易邀功了；反之，眾議員若能爭取到計畫型補助款到他的選區中，雖然州長依然可以邀功，但至少相較於一般性補助款，眾議員比較可以

3. 學者研究顯示國會議員所帶回的牛肉可能會轉為他們的選舉資金 (Samuels, 2002)，或是用來滿足一些利益團體，以排除其他可能的參選者 (Bickers and Stein, 1996)。

宣稱是他在國會中的努力，所以才會分配到其選區之中。

這樣的情況在台灣也是相同的，對於一般性的補助款，縣市長具有相當大的分配權，但對於指定用途的補助款，立委至少可以宣稱是他們爭取到的，中間少了一個縣市首長分配的過程，使立委更能向選民邀功。

第三個原因是集體行動的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Lee, 2003)。在美國眾議員選制下，一個州可能有數位眾議員，但集體行動困境使他們很難一起努力來爭取聯邦對州的補助，因為只要有爭取到聯邦對州的補助，州內的其他眾議員也可宣稱他們有努力爭取來邀功，為了避免集體行動的困境，每一位眾議員較不會想要爭取聯邦對州的補助款，反而會努力爭取指定用途的計畫到他的選區中，以避免其他眾議員來搭便車。

同理，在 SNTV 選制下，一個選區可以選出多位立委，其中如果有一位立委很努力的爭取指定用途補助款在其選區之中，則其他立委也可以搭便車來邀功，宣稱自己也有出力，在這樣的情況下，每一位立委都有搭便車的動機，因此較不會有誘因去爭取指定用途的補助款，造成集體行動的困境。若選區的應選席次很少，或是選區中立委們的地盤很明顯，這樣將使其他立委不容易搭便車，使得立委較有誘因去爭取指定用途的補助。

因此立法委員可能因為上述三個因素還是會爭取指定用途之補助款，但指定用途補助款是如何分配的呢？Lazarus (2009) 指出程序卡特爾模型(procedural cartel model) 可以用來分析指定用途計畫的分配，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指定用途之補助會先分給兩黨的國會領袖，然後由他們來進行黨內各議員間的分配，希望能夠幫助黨內的議員在下一次的選舉中獲勝，以穩固黨的國會勢力 (Lazarus, 2009;

Engstrom and Vanberg, 2010)。

爲了避免其它黨籍委員搭便車的問題，國會中之政黨領袖在分配指定用途補助款時，會將較多的牛肉分給地盤較明顯的立委，這樣會使得分到牛肉的立委在大選中獲得較大的利益，因地盤越明顯的立委，通常在選區中的選票集中度較高，因此本文認爲選區政治勢力集中度越高的選區，該選區將獲得較多的人均補助款。

此外，筆者認爲在複數席次選區中，選區政治勢力的集中度本身其實會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是選區規模，二是選區內的競爭程度。選區規模越小及競爭越不激烈時，選區政治勢力越集中，其對選區補助金額的影響可分析如下。

羅清俊、廖健良（2009）與羅清俊（2009）顯示選區越小，選區所獲得的補助金額會越多，選民也越能感受到立委爭取經費的努力。因選區越小，選區政治勢力集中度越高，因此筆者推論政治勢力集中度越高，則選區所獲補助金額會越多。

但從選區競爭程度來看，則有兩種不同的分析角度：一是從可課責的角度來看，另一則是競爭的激烈程度來看。

首先，從可課責性來看，若政黨選票集中度越高，則選民對於該政黨有更多的期待，課責性也提高，則該選區獲得之人均補助款越多；反之，若政黨競爭激烈，選民對政黨課責性模糊，選區獲得人均補助款較少。羅清俊（2009）發現政治勢力集中度越高，民眾對立委的期待、監督、與課責性越強，立委也就越有動機爭取補助款，該選區所獲得的人均補助款也就會較多。此外，選區的政治勢力集中度越高，該選區就越會屬於某些特定議員的「地盤」（Batto, 2001），選民對議員辨識度高，因此課責性也較高，如此議員便要努力多帶回肉桶。

其次，從競爭的角度來看，有人認為若兩陣營的競爭越激烈，政治勢力越分散，則立委應會更積極從事選區服務來爭取個人選票（Carey and Shugart, 1995; 盛杏媛，2005；王靖興，2009），其隱含的是選區競爭越激烈，則選區所獲得的補助款會越多。但筆者認為在 SNTV 選制下，競爭越激烈，立委會越積極爭取個人選票，但不一定能爭取到較多的指定用途補助款，其理由如下：

第一是選區服務與指定用途的補助有一些不同。Fenno（1978）是認為選區服務可分為個案服務及計畫協助，黃秀端（1994）在考量我國國情後，認為立委心目中的選區服務有四大類，分別為婚喪喜慶、人士請託、受到冤屈及爭取地方利益。前三項為服務性回應，立委在進行這些服務時，必須了解當事人或委託人的情況，並依據其狀況予以幫助，因此會發生立委與當事人之間的直接關係，當事人在其狀況獲得解決後，應會感激立委的幫忙，而可能在下一次的立委選舉中予以回報，因此可以增加立委的個人選票。但最後一項的爭取地方利益，包含了爭取指定用途之補助，依據前述的理由，指定用途之補助可能會被一般選民忽略，並且可能會被選區中的其他立委搭便車，因此若立委想要爭取個人選票，則選區服務是較佳的選項，爭取指定用途補助款不見得有利。

第二是國外的研究顯示選舉競爭越激烈，也就是在上次選舉中獲勝幅度越小的國會議員有比較強的動機爭取指定用途補助款，實證研究結果也顯示他們的確會獲得較多的指定用途補助款（Stein and Bickers, 1994; Bickers and Stein, 1996; Lee, 2003），但國外研究中的國會議員的選制是單一選制，因此不會有 SNTV 制下搭便車的問題。

在 SNTV 選制的複數席次選區中，每一個選區必有一至數位委

員是險勝的，依據前述的分配方式，國會中的政黨領袖爲了想幫助他們贏得下次的大選，或許會想多分配一些指定用途補助款給他們，但若真得分配給他們，則有可能被該選區中其他的立委（不論是同黨的或是其他黨籍的）搭便車，宣稱是他們爭取到的，使選民將很難分辨究竟功勞將歸給誰，這樣的分配方式將幫不到想幫忙的人，除非該名立委的地盤很明確。

綜合上述，筆者認爲選區競爭越激烈，不一定會使選區所獲得的補助款增加，因此選區政治勢力集中度與選區補助金額之間的關係可能是由選區規模、可被課責的程度、及避免被其他立委搭便車所主導，也就是說選區政治勢力集中度越高，則選區所獲得的補助款越多。因此本文的第二及第三個假設如下：

假設二：在控制其他條件之下，第五屆複數選區中，選區政治勢力集中度越高的選區，選民對立委的課責性越高，且被其他立委搭便車的可能性越低，該選區將獲得較多的人均補助款；選區政治勢力集中度越低者，選區立委受到集體行動邏輯的影響，且選民課責性較低，選區獲得的人均補助款較低。

假設三：在控制其他條件之下，第六屆複數選區中，選區政治勢力集中度越高的選區，選民對立委的課責性越高，且被其他立委搭便車的可能性越低，該選區將獲得較多的人均補助款；選區政治勢力集中度越低者，選區立委受到集體行動邏輯的影響，且選民課責性較低，選區獲得的人均補助款較低。

最後，針對第五屆及第六屆立法委員的肉桶行爲來做分析，第六屆立委與第五屆立委不同之處在於他們要競選連任時，所面對的是單一選制、立委席次減少、及選區重新劃分的情況。因此嚴格來說，第六屆的立委並不是新選制及新選區下的現任立委，因爲新選區中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且將尋求連任的現任立委，第六屆立委仍要選擇新的選區參選，因此這是一個開放席次（open seat）的選舉，

國外研究顯示這樣的情況會吸引實力較強的挑戰者來參選，例如民選的鄉鎮市長或參與過選舉的地方型政治人物（Banks and Kiewiet, 1989; Bickers and Stein, 1996）。

在面臨新選制及新選區下，立委的參選動機及行為可以用兩階段模型來分析，第一個階段是黨內的初選，同黨籍的參選者必須勝選才能進入第二階段的立委大選，與其他黨籍的候選人競爭（Banks and Kiewiet, 1989; Stone and Maisel, 2003）。Stone and Maisel(2003)的分析顯示在單一選制下，某一黨籍國會議員參選人在第二階段大選的勝選機率與選區內該政黨的勢力成正相關，因此若在一選區中，某黨的勢力較大，則該黨國會議員候選人在大選中獲勝的機率也較大，但這樣的情況將使得該黨的第一階段初選會較激烈，因為只要在第一階段獲勝，則在大選中將可輕易獲勝，因此有實力的政治人物將會參與該選區的初選，但在初選中，因為各參選人都同黨籍的，因此獲勝的機率與個人的條件或實力成正相關，⁴ 因此每一位想參選立委的人想最大化最後當選立委的機率（初選勝選機率*大選勝選機率），但不幸的是初選獲勝的機率與在大選中獲勝的機率是成反比的（Banks and Kiewiet, 1989; Stone and Maisel, 2003）。

台灣第六屆立委也面臨同樣的處境，例如對一位國民黨的立委來說，他當然想選擇國民黨勢力較強的新選區參選，但他必須考慮其他同黨籍的立委，甚至地方實力派的政治人物也會參與初選，使得他最後當選立委的機率下降，因此這也是一個兩難的情況。

另外，從政黨的角度來看，國會中的政黨領袖在分配指定用途補助款的時候，他會從政黨整體的利益來考量，在面臨新選區及新

4. 學者研究參選者的哪些個人特質會影響其當選機率，請參閱 Mondak (1995) 及 McCurley and Mondak (1995)。

選制時，並沒有所謂的連任者，所有的第六屆立委都在計算應當在哪個新選區參選及可能面對的對手，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會中的政黨領袖想要最大化在下次選舉中，該黨籍立委之當選人數，他們將會把較多的牛肉送至兩類選區，以提高下一屆該黨的立委席次：

1. 大選中會贏的新選區：即某一黨在此選區占明顯優勢者，也就是在此新選區中，政黨勢力較集中的情況；
2. 新選區中已有明顯占優勢的同黨參選人，且政黨勢力接近的新選區：在某政黨勢力相近的新選區中，若已有一位明顯占優勢的該黨立委，則顯示此一新選區是此一立委之地盤，他將在該黨的初選中獲勝，並進而成為該黨在大選中的候選人，為了最大化他在大選中的獲勝機率，不論從個人的立場或是從政黨的立場，都會將牛肉送至此新選區中，也就是個人選票較集中的選區。

不論是上述的哪一種狀況，皆是將牛肉送至政治勢力較集中的新選區。在政黨勢力接近且黨內競爭激烈的新選區中，政黨或許有送牛肉給此類選區的誘因，但因為在黨內初選時，各可能參選之立委會有一番激烈的競爭，若將牛肉送進此選區，因搭便車的關係，個別立委很難宣稱其功績，因此就個別立委的角度來看，爭取牛肉的動機較低。

因此，本文推論新選區的政治勢力集中度（包含政黨及個人勢力的集中度）會與新選區所獲得補助款金額成正向關係，且這正向關係在第六屆立委任期中會更明顯。主要的原因是第六屆立委選舉之制度仍適用舊選制及舊選區，第五屆立委還是需要透過照顧大選區下廣泛的選民才能當選；同時，第五屆立委也還不知道新選區究竟在哪裡，因此不知肉桶要往哪些新選區去送，反觀第六屆立委及

國會內的政黨領袖，爲了極大化連任的機率及政黨的席次，極可能將肉桶送至其具優勢的新選區，依照上述論述，政治勢力集中度與補助款金額的正向關係會有較明顯的正向關係。因此，本研究的第四個假設爲：

假設四：新選區之政治勢力集中度較高者，會得到較多的人均補助款的現象，第六屆比第五屆明顯。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 研究對象、研究範圍與分析單位

本研究所針對的是第五屆與第六屆立委任期內對於指定用途補助款之分配行爲，所欲觀察的重點是分配至各選區的補助金額，在查詢許多政府指定用途型補助計畫後，本研究選擇以「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之補助金額為分析重點。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是行政院自民國 88 年起施行至今，內政部營建署爲其主管機關，它的運作是由營建署編列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進行重要景觀據點之示範改善，其目的在於改善台灣因經濟發展快速，導致城鄉地貌單調化與髒亂之景象。本研究的資料範圍爲民國 92 至 96 年的創造城鄉風貌計畫補助款，其中 92 至 94 年爲第五屆立法委員任內所審查通過，95 與 96 年爲第六屆立法委員任內審查通過。⁵ 茲將研究期間及所採用之資料列如表一所示。

5. 由於 2008 年當年補助款資料僅有總額，沒有詳列各縣市鄉鎮市區申請到的核定補助款計畫細項，因此本研究的敘述統計部分，表四及表五有納入 2008 年資料，但在後續之迴歸分析，則沒有納入 2008 年資料。總額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第三期計畫核定本（內政部營建署，2008）。

表一 研究期間示意表

| 立委屆別 | 第五屆 | | 第六屆 | | | |
|--------|------|-----------|-------------------------|----------|------|-------|
| 年份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 第七次修憲案 | | 8 月份立法院提案 | 6 月修憲案通過 8 月選區劃分原則通過 | 12 月確定選區 | | |
| 審查補助款 | ○ | ○ | ○ | ● | ● | ● |
| 選舉制度 | SNTV | | | | | 單一選區制 |

註：○為第五屆立委審查補助款；●為第六屆立委審查補助款。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2011。

本文以此計畫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該計畫是典型的分配政策，且已有學者分析此計劃之資料來檢證台灣的分配政策（羅清俊，2000a）。此計畫屬於計畫型補助（project grant）或是指定用途的補助（earmarked grant），不同於依照公式分配補助款的一般性補助（formula grant），在計畫型或指定用途型補助款的分配過程中，政治行為者通常有較多之介入、影響與議價的空間（黃紀、林怡均，2009）。⁶ 黃秀端（1994）發現立法委員為地區爭取地方建設，最常見的是道路修建、學校、醫院、及活動中心的設置美化等，他們必須代表選區選民爭取利益，這也得到其他學者的證實（盛杏媛，2005；王靖興，2009；羅清俊，2009；盛杏媛，2010）。

6. 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在研究期間的每年補助總額約在 6~42 億元，但此期間的中央分配給地方政府每年的統籌分配稅款金額約在 1400~2000 億元，一般補助款的金額也約在一千多億元，因此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的補助款僅占全部中央對地方補助很小的比率。

甚至選民也期待立委能將補助利益帶回到選區之中（羅清俊，2008）。雖然該補助款表面上是由縣市政府提出，但由於經費的流動是直接落實到地方以及社區，立委對此計畫之補助款有影響力還有影響動機（羅清俊，2009）。⁷ 綜上，本補助款計畫具有濃厚分配性質。

第二、該計畫符合本研究以指定用途補助金額作觀察對象的目的。過去檢證台灣選舉制度對分配政治影響之相關文獻，有的是以立委提案行為為觀察重點（Sheng, 2006; 羅清俊、謝瑩蒔，2008; 羅清俊、廖健良，2009），有的則是觀察選民對立委選區服務的期待（羅清俊，2008），選制改變固然可能增加立委提案動機，或者提高選民對立委的期待，但立委之分配行為最後是否有落實到地方選民、選民是否真得受到照顧卻不得而知。本文嘗試以補助金額作為觀察重點，試圖檢驗立委分配行為對選區所獲得實質好處之影響，事實上，立法委員也常在選民通訊或競選文宣中傳達此類資訊，例如第六屆台北市北區的立委可以很明確的宣揚其協助爭取到台北市北投區「燕子步道規畫與社區環境綠美化」的經費，或是松山區「東榮里社區風貌營造工程」等，以加強選民印象爭取個人選票。雖然羅清俊（2009）已做了類似研究，但也是台灣少見以補助金額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仍將以選區所獲得補助金額為研究對象。

第三、內政部營建署提供城鄉新風貌學習輔導暨專案管理中心計畫資訊平台，該平台的資料庫詳列各補助計畫之金額與地址，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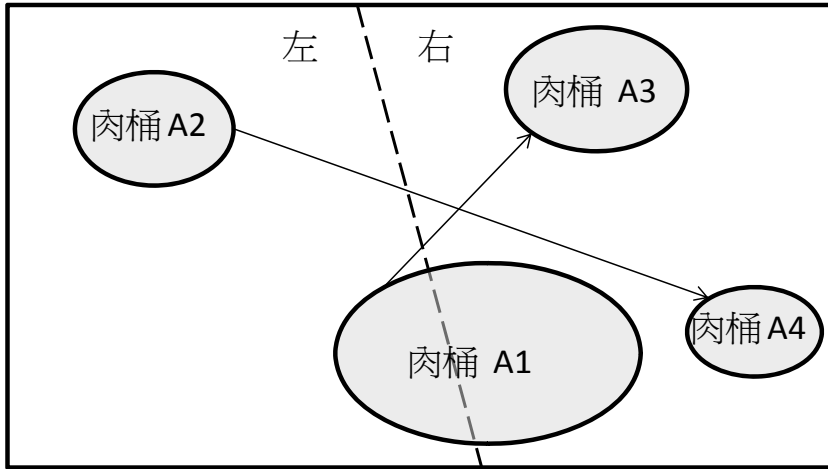
7. 「營建署從民國八十八年推出城鄉新風貌計畫，至今接受三千多案，表面上都是縣市政府提出，但相關人員指出，立委『或多或少』會關心，會協助縣市政府爭取...這些錢對鄉樁非常有效果。」（楊濡嘉，2007）。

查詢到每一個補助計畫之確實金額與地理位置，進而了解肉桶在次級行政區層次（鄉鎮市區）之地理分布狀況。⁸

本文以第七屆單一選區制下的新選區為分析單位，這樣做的目的與好處在於：第一、能表現出地理遷移效果。在舊選制下，舊選區大多是以一個縣市為單位，肉桶輸送的區域可能橫跨好幾個次級行政區（鄉鎮市區）。第六屆立委及政黨領袖面臨新選制及新選區，為了將選票及政黨席次極大化，會將肉桶往自身優勢選區輸送，增加自己在新選制選區的個人選票及政黨支持度，以提高其當選的機會。因此，若使用舊選制選區作為分析單位，則無法看出選區肉桶增減與立委爭取肉桶動機之間的關連，而以新選制選區作為分析單位，則較能看出肉桶在次級行政區地理遷移效果。

茲將上述概念以圖一說明之，外圍實線所建立的是一舊選區，假設在修憲後分為兩個新選區：左選區及右選區，並以虛線為界線，在舊的選舉制度下，立法委員及政黨領袖為照顧較大的舊選區，可能會將肉桶分配在較大的地理區域上，例如 A1 及 A2，但面臨新的選制及新選區，假設有某一立委及所屬政黨在右選區較具優勢，但在新的左選區中，則較無明顯占優勢的現任立委或較占優勢的政黨，則該立委及所屬政黨應會選擇新的右選區參選，以極大化其連任機率，並將可獲得的肉桶集中在右選區上，如圖上 A3 及 A4 所示圖中箭頭的部分，至於原本左選區可以獲得的牛肉則可能會被刪減，因為沒有明顯占優勢的候選人會出來爭取。下圖一顯示肉桶的地理遷移效果。

8. 資料來源為內政部營建署所提供之城鄉風貌學習輔導暨專案管理中心計畫資訊平台（內政部營建署魅力城鄉主題網，2011）資料取得方式為筆者向內政部營建署提出政府資訊公開申請書，其內容包含歷年（88年至97年）城鄉風貌補助計畫相關資料。



圖一 地理遷移效果概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第二、可以比較第五屆與第六屆立委肉桶分配行為的差異。由於新選區劃分方式在 2006 年決定，第五屆立委並不知情新選區的劃分，因此無法先做準備，而第六屆立委則知道新選區的劃分，因此地理遷移效果只會在第六屆立委任期內發生，所造成的結果是對新選區而言，立委占優勢地區與其所獲得之補助金額間的連結，在第六屆會比第五屆更明顯。因此藉由以新選區為分析單位，本研究可以比較立委在不知道與知道新選區劃分的兩種情況下，其肉桶行為是否有差異。

(二)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次級資料進行量化分析，首先利用數據與圖表呈現初步分析結果。進一步根據分配理論相關文獻，特別是有關影響分配行為因素的文獻，針對 73 個選區，包含單一席次選區及複數席次選區，建立實證模型一，來檢定假設一，也就是單一席次選區所獲得的補助款是否會比複數席次選區多？

$$\text{grant} = \alpha_0 + \beta_1 \text{SIN} + \beta_2 \text{HI} + \beta_3 \text{HIC} + \beta_4 \text{PARTY} + \beta_5 \text{COM} + \beta_6 \text{SEN} + \beta_7 \text{GKMT} + \beta_8 \text{BUD} + \beta_9 \text{LAND} + \beta_{10} \text{DEN} + \varepsilon \quad (1)$$

此外，為檢視本研究之假設二、三、及四，本研究將單一席次選區樣本剔除，針對 69 個複數席次選區，建立實證模型二：

$$\text{grant} = \alpha_0 + \beta_1 \text{HI} + \beta_2 \text{HIC} + \beta_3 \text{PARTY} + \beta_4 \text{COM} + \beta_5 \text{SEN} + \beta_6 \text{GKMT} + \beta_7 \text{BUD} + \beta_8 \text{LAND} + \beta_9 \text{DEN} + \varepsilon \quad (2)$$

對於此二個模型的估計，本文分別以第五屆與第六屆立委任期內的資料為分析對象，並以最小平方估計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估計其係數。

本研究並未使用各年度的資料來形成一個時序資料（panel data），主要是因為每一年的總補助金額並不相同，且變動甚大，筆者認為立法委員在考慮帶肉桶回家時，會以他整個任期所能獲得的肉桶來作考量，而不會專注在每一年的補助金額。

表二 相關變數說明

| 代號 | 變數 | 操作型定義 | 預期影響 | 資料來源 |
|-------|------------|---|------|--------------------|
| Grant | 新選區人均補助款 | 新選區在第五屆及第六屆獲得補助款金額除以該選區選舉人數(元) | N/A | 內政部營建署 |
| SIN | 單一席次選區 | 虛擬變數，單一席次選區者設為 1，複數選區席次者設為 0 | | 中選會 |
| HI | 新選區個人選票集中度 | (新)選區各候選人之得票率平方和 | + | 中選會 |
| HIC | 新選區政黨競爭強度 | 泛藍得票率之平方加上泛綠得票率之平方 | + | 中選會 |
| PARTY | 政黨版圖 | 泛藍得票率大於泛綠得票率則設定為 1，反之則為 0。 | + | 中選會 |
| SEN | 立委資深度 | 先算出各選區各立委曾經擔任立委的屆數；再將該選區各立委屆數相加求總合；最後以總和除以該選區法定立委席次，得該選區立委資深度 | + | 立法院全球資訊網 |
| COM | 內政委員會資深度 | 先算各選區立委曾擔任內政委員會委員之會期次數；再將各委員之次數加總；次數加總除以該會期內政委員會人數，得其資深度 | + | 立法院全球資訊網 |
| GKMT | 縣市長黨籍 | 國民黨籍縣市長設定為 1，其餘為 0 | - | 中選會 |
| BUD | 自有財源比 | 各縣市非補助收入占歲出比例(%) | - |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
| LAND | 選區土地面積 | 各選區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 + |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各區公所 |
| DEN | 選區人口密度 | 選區選舉人數除以各選區土地面積(人/平方公里) | + | 中選會；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各區公所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 變數測量

依變數為該屆立委任期內，對於新選區中，每人平均獲得核定補助款的金額。計算步驟如下：首先，計算出各新選區獲得補助款。雖然原始資料詳列各項補助計畫坐落之鄉、鎮、市、區或街、路、社區，但因本文以新選區為分析單位，有些資料需進一步細分至「里」的層次，本文透過「內政部戶政司村里街路門牌查詢系統」，⁹ 輸入計畫坐落之路名或街名，羅列出其所涵蓋之里，再比對其所屬選區。例如，「台北市民權東路景觀與綠美化改善規劃設計」計劃案同時涵蓋民有里、民福里、三民里、富錦里、精忠里、東榮里等里，屬於台北市第三選區中的松山區 20 里之內，因此歸化為台北市第三選區。然而，有些資料因涵蓋範圍過廣，無法以選區作劃分，例如，「牯嶺街社區環境改造計畫」涵蓋了網溪里、龍福里、板溪里、南福里、螢圃里，而這些里一部分屬於台北市第五選區，一部分屬於第八選區，因難以歸化故不列入分析。¹⁰ 此外，本文依變項為補助金額，並包含數個年度資料，因此將各選區每年獲得補助款以 2006 年躉售物價指數為基數作調整。接著，將選區補助款除以該屆各選區選舉人數，得到選區人均補助款。

本研究主要之政策變數為政治勢力集中度，依據前述，發現台灣立委所面臨的競選壓力來自其所屬政黨之內以及政黨之間，且國會之政黨領袖在分配指定用途補助款時，會考量政黨勢力及個別立委實力的分布狀況（Lazarus, 2009; Engstrom and Vanberg, 2010; 盛

9. 可參閱內政部戶政司（2011）。

10. 詳細樣本統計數據請參見表二。

杏媛，2010），因此，本文將政治勢力集中度分為個人與政黨兩個層次，並以選區個人政治勢力集中度以及選區政黨政治勢力集中度兩個變數測量之。

1. 選區個人政治勢力集中度之衡量：

本文選擇以 Herfindahl index 來衡量選區個人政治勢力集中度。Herfindahl index 亦稱為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或簡稱 HI，是經濟學上為了解市場競爭程度，常用來測量產業市場集中度的指標。其計算方式為產業中各企業市場佔有率之平方和（Hirschman, 1964）。當 HI 值越大，表示市場集中程度越高，大企業壟斷程度越高。其好處不僅能測得大企業的市場率，更能反映市場結構，顯示大企業對市場的影響程度。自由民主體制下的政治行為如同市場機制下的經濟行為，選區如一個自由市場，候選人向作為消費者的選民兜售政治理念，與候選人合意的選民就用選票買單（Downs, 1957）。套用 Anthony Downs 以市場經濟理性行為類比政治行為的概念。

本文沿用 Herfindahl Index 的觀念，來計算選區內個人選票之集中度，用以衡量選區內個人政治勢力集中度。當該選區 HI 的計算值越高，代表該選區內之選票越集中，表示選區民意越被特定立委壟斷，選區民意市場結構越趨向獨占或寡占競爭，選民對該特定幾位立委的課責性越清楚，因此立委們不敢怠慢會提供肉桶立法；同時，立委也基於自身有穩固的民意地盤，面臨競爭度激升的新選制選舉，較其他人或相較自己在其他選區較有優勢出線，也會持續為老主顧提供肉桶以求連任。因此，本文預期 HI 值越高，則該選區政治勢力越集中，屬於特定立委的政治地盤，選民對於特定立委的課責性越強，特定立委若想在新選制下獲得連任，則對該選區肉桶立法

動機越強，該選區獲得人均補助款可能越多。

本文計算選區個人選票集中度的方式為：首先，列出第五屆或第六屆候選人名單及得票數，接著，將新選區內各候選人得票數相加得總得票數，並以各候選人得票數除之，得到候選人 i 於新選區 j 之得票率 P_{ij} 。最後，將新選區 j 中，所有的 P_{ij} 平方後相加得 HI。

由於本研究是以新選區為分析單位，有時會碰到一個新選區有兩組不同候選人的情形，例如新選區中的台北縣第五選區為樹林市、鶯歌鎮、及新莊市 9 里，樹林市與鶯歌鎮屬於舊選區的台北縣第一選區，新莊市的部分則屬於舊選區之台北縣第二選區，因此呈現出原屬兩舊選區之候選人並列的情況。本文處理的方式為將兩組候選人之得票數，除以兩組相加之總得票數，所得之得票率 P_{ij} ，平方後相加得 HI。

$$HI_j = \sum_{i=1}^n (p_{ij})^2$$

j ：第 j 個選區（新選區）。

i ：第 i 個候選人（在第 j 個選區）。

P_{ij} ：第 i 個候選人於第 j 個選區之得票率 = $\frac{\text{第 } i \text{ 個候選人之得票數 } (V_{ij})}{\sum_i V_{ij}}$

n ：在 j 選區之候選人人數。

使用 Herfindahl index 的好處在於，第一、HI 值可反映新選區得票分布狀況 (Kalseth and Rattsø, 1998)。它表達的是民意市場結構是獨占、寡占或完全競爭的局面，選區之 HI 計算值越高，代表該選區內之政治勢力越集中，這些高得票率之立委，即掌握選區較大之政治勢力，他們將是最有機會從黨內初選脫穎而出，甚至連任的人，因此，他們便會有較強烈動機提供肉桶給選區；第二、HI 計算值同時反映不同選區規模對補助款的影響。應選名額較少之選區，

相對地候選人數量（ n ）較少，各候選人之得票率會較高，因此HI值較大；反之，應選名額較多之選區，因候選人數（ n ）較多，各候選人之得票率會較低，因此HI值較小。由於HI中的選區候選人數（ n ）可以反映選區規模大小，¹¹ 因此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不同選區規模對補助款影響的差異。第三、HI可反映出不同選區之原始選票的資訊，因此，即使新選區是在第七屆立委選舉時才開始使用，但本研究仍可計算出第五屆及第六屆立委選舉結果在各新選區之HI值。

總括來說，選區個人選票集中度指數的資訊整合了選區席次之大小及選區內競爭狀態兩種資訊。若選區席次越小，因候選人數也會較少，當選者的得票率也會較高，因此HI指數會較高；但若有兩個選區有相同的應選立委席次，則競爭較激烈的選區，因得票率較平均，其HI指數會較低。總之，當選區越小、政治勢力越集中時，HI指數越高。依據前述之研究假設，筆者預期HI指數越高，則選區所獲補助金額會越多。

2. 選區政黨選票集中度：

Kalseth and Rattsø（1998）以 Herfindahl Index 作為衡量政黨競爭程度的指標，亦即當政黨在地方議會擁有席次比率之平方和之值越高，代表政黨分裂度越高，地方議會政治勢力越不集中，政黨競爭度越強。黃紀、林怡均（2009）探討黨際選舉競爭度對地方補助款的影響，其以政黨得票率平方和之倒數表達黨際選舉競爭度，並預期當該值越大表示政黨競爭越激烈，地方獲得補助款越多。研究發現統計上顯著，但得到相反的結果，亦即該選區在上一次立委選舉黨際競爭度越激烈，所獲得補助款越少。

11. 以選區員額等級作為選區規模的指標，將選區規模分為大、中、小，其中小選區為選區員額1至4名者；中選區為5至8名；大選區為9名以上（羅清俊、廖健良，2009）。

根據上述文獻，本文認為選區內之政黨勢力集中度也是一重要的變數，特別是立委選制改為單一選區制後，政黨的對決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盛治仁，2006；盛杏媛，2010），因此本文以 Herfindahl Index 來計算選區內政黨選票集中度，並以此來衡量選區內政黨勢力分布態勢，本文將政黨體系設定為兩大黨（Cox and Niou, 1994），並以此計算泛藍與泛綠兩大陣營在選區內的政治勢力集中度。

本文計算選區政黨選票集中度的方式為，首先，列出各新選區之候選人名單、得票率以及推薦政黨。接著，確定各候選人所屬陣營為泛藍（B）或泛綠（G）。所謂泛藍為中國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等，泛綠為民主進步黨、建國黨、台灣團結聯盟等。對於無黨籍者，先剔除得票率不到 2% 者，再依更多背景資料進行判斷其票源偏向泛藍或泛綠。無法歸類者，則不列入兩大陣營內。然後，對該選區加總泛藍及泛綠的得票數，得出總得票數，再以泛藍或泛綠之得票數除以總得票數，得到個別陣營的得票率。最後，再分別平方後相加得 HIC_j 。

$$HIC_j = \sum_{i=1}^2 (P_{ij})^2$$

j：第 j 個選區（新選區）。

i：陣營個數，設定為 2，即為泛藍及泛綠兩陣營。

P_{ij} ：泛藍或泛綠在第 j 個選區之得票率。

因在計算選區政黨選票集中度時只有計算兩個陣營，因此這個指標所衡量的是兩個陣營之間的競爭強度，HIC 與選區所獲得的補助款的關係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從可以課責的程度；另一方面則是競爭的激烈程度來看。依據前述的理論推導及研究假設，在第五屆立委期間，因立委仍面臨 SNTV 選制，因此預期 HIC 不會影響

選區所獲得之補助款；但在第六屆立委期間，因立委將面臨選制改變，預期 HIC 越高，則選區獲得之補助款會越多。

本模型上包含許多控制變數，茲列述如下：

1. 政黨版圖：

為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先分別算出該選區泛藍得票率與泛綠得票率；若泛藍得票率大於泛綠得票率則登錄為 1，反之則為 0。第五屆與第六屆立委期間 (民國 92 年至 96 年) 雖為民進黨執政時期，然立法院仍舊是國民黨占多數，政策或預算的決定權主要操之在國會，因此我們預期若該選區為泛藍選區時，該選區會獲得較多人均補助款。

2. 各選區立委資深度：

國會議員平均年資越高，越熟悉議事規則對政策敏感度越敏銳，懂得如何將特殊利益輸送給自身選區 (Roberts, 1990)。如何衡量此變數，則是參考台灣其他分配政治學者之作法 (羅清俊、廖健良, 2009)，先算出各選區各立委曾經擔任立委的屆數；再將該選區各立委屆數相加得總和；最後以總和除以該選區法定立委席次，得該選區立委平均資深度，用以代表立委資深度。我們期待立委越資深，該選區獲得人均補助款越多。立委屆數由民國三十七年第一屆立法委員算起，包括之後的七次增額補選，一直計算到第六屆。其中不分區立委的資歷、中途離職者亦算入，至於是否連任不在限制內。

3. 內政委員會資深度：

委員會是國會議員肉桶立法重要運作場域 (Plott, 1968; Alvarez and Saving, 1997; 羅清俊、萬榮水, 1999; 羅清俊, 2000b)。本文以監督內政部營建署的內政委員會為主要觀察對象。其操作化方

式，亦參考台灣分配政治學者作法（羅清俊、廖健良，2009）：先算各選區立委曾擔任內政委員會委員之會期次數；再將各委員之次數加總；將總數除以該會期內政委員會委員人數，得出該選區委員會資深度。本文預期選區委員會資深度越高，所獲得人均補助款越多。

4. 縣市長黨籍：

總統對肉桶立法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因此，與總統同黨籍的縣市長應會獲得較多補助款（Larcinese et al., 2006）。本文針對新選區所屬縣市長黨籍建立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國民黨籍設定為 1，反之為 0，並期待民進黨籍縣市長的選區會獲得較多補助款。

5. 自有財源比率：

過去研究顯示台灣縣市政府之自有財源比率高者，代表其財政狀況較具自立能力，因此所獲得補助款較少（羅清俊、萬榮水，1999；羅清俊，2000b；蘇彩足，2001）。本研究則定義自有財源比為各縣市之非補助收入占歲出之比例，因此比率越高，代表自有財源比越高，則自中央獲得的補助金額應會越少。

6. 選區土地面積：

考慮到「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旨在改善城鄉地貌，因此放入選區土地面積變數，預期土地面積越大，則獲得補助金額越多，資料取自行政院主計處所統計之各縣市與或鄉鎮市區土地面積。

7. 人口密度：

同樣考慮到「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之目的，人口密集處多為城市，城市地貌發展迅速變遷劇烈，因此可能需要較多資源投入美化與改善。操作化定義為選區選舉人口數除以選區土地面積。

四、研究結果

(一) 資料描述與敘述統計

針對創造城鄉新風貌的每一個補助計畫，本文先查詢其地址，以判斷其位於哪一個新選區內，樣本經查詢清除後，整理如下表三，原始總計劃數共 3776 件，剔除資料不清楚或無法分類之計畫數 317 件，剩下的可用之分析計畫數為 3458，剔除了大約 10 % 的計畫。

表三 創造城鄉新風貌之補助計畫樣本統計表

| 縣市 | 總樣本數 | 資料不清 | 無法歸類 | 可用樣本數 |
|-----|------|------|------|-------|
| 台北市 | 88 | 2 | 24 | 62 |
| 高雄市 | 141 | 0 | 17 | 124 |
| 台北縣 | 200 | 13 | 10 | 177 |
| 宜蘭縣 | 167 | 1 | 0 | 166 |
| 桃園縣 | 135 | 3 | 26 | 106 |
| 新竹縣 | 176 | 0 | 0 | 176 |
| 苗栗縣 | 188 | 1 | 11 | 176 |
| 台中縣 | 150 | 0 | 11 | 139 |
| 彰化縣 | 174 | 0 | 15 | 159 |
| 南投縣 | 172 | 0 | 9 | 163 |
| 雲林縣 | 199 | 1 | 19 | 179 |
| 嘉義縣 | 192 | 2 | 18 | 172 |
| 台南縣 | 177 | 0 | 19 | 158 |
| 高雄縣 | 261 | 1 | 24 | 236 |

| | | | | |
|-----|------|----|-----|------|
| 屏東縣 | 318 | 4 | 20 | 293 |
| 台東縣 | 90 | 0 | 0 | 90 |
| 花蓮縣 | 120 | 1 | 0 | 119 |
| 澎湖縣 | 110 | 0 | 0 | 110 |
| 基隆市 | 96 | 1 | 0 | 95 |
| 新竹市 | 82 | 1 | 0 | 81 |
| 台中市 | 144 | 0 | 25 | 119 |
| 嘉義市 | 91 | 1 | 0 | 90 |
| 台南市 | 185 | 4 | 32 | 149 |
| 金門縣 | 88 | 1 | 0 | 87 |
| 連江縣 | 32 | 0 | 0 | 32 |
| 總計 | 3776 | 37 | 280 | 3458 |

註：剔除樣本者指資料不清或無法歸類者。資料不清指原始資料上未明列該計劃詳細金額；無法歸類者指該計畫橫跨多選區，無法將其規劃為特定選區之內桶。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魅力城鄉主題網（2011）及作者自行整理。

第五屆（92、93、94 會計年度）城鄉風貌計畫總補助款金額為 58.4 億元，第六屆（95、96、97 會計年度）為 53.9 億元，第六屆總補助款比第五屆總補助款略為降低約 7.2%，這可能是因為計畫型補助有階段性安排（內政部營建署，2008）。¹² 表四為變數之敘述統計。新選區中之人均補助款在第五屆平均數為 548 元，標準差為 1538，在第六屆平均數為 437 元，標準差為 839，顯示人均補助款在第六屆較少，但補助款集中在特定選區的情形較明顯。

12. 內政部營建署（2008），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第三期計畫(核定本)中的第 3~5 頁提到第二期計畫多以個案補助為主，第三期則多加強分散式、地方性、精緻型、多樣化、內發性、「輕薄短小」與「美（學）感（性）遊（憩）創（意）」的型態。

表四 變數敘述統計

| 變數 | 第五屆 | | 第六屆 | |
|-----------|------|------|------|------|
| |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 人均補助款 | 548 | 1538 | 437 | 839 |
| 選區個人選票集中度 | 0.1 | 0.08 | 0.1 | 0.09 |
| 選區政黨選票集中度 | 0.5 | 0.07 | 0.5 | 0.02 |
| 政黨版圖 | 0.7 | 0.44 | 0.6 | 0.49 |
| 內政委員會資深度 | 1.8 | 0.44 | 2.2 | 0.48 |
| 選區立委資深度 | 9 | 11 | 10 | 11 |
| 縣市長黨籍 | 0.47 | 0.5 | 0.47 | 0.5 |
| 自有財源比 | 44% | 15% | 44% | 15% |
| 選區土地面積 | 496 | 838 | 496 | 838 |
| 選區人口密度 | 4587 | 6789 | 4784 | 7138 |
| 樣本數 | 73 | | | |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魅力城鄉主題網（2011）及作者自行整理。

表五為在 73 個新選區中，第五屆與第六屆選區人均補助款之前十名。表五顯示連江縣、金門縣、台東縣以及澎湖縣等單一席次選區在這兩屆中皆獲得較多補助款，是否證明了本研究的假設一，即單一席次選區所獲得的人均補助款會較多，仍須透過多元迴歸分析進一步檢證。

透過敘述統計，本研究發現單一席次選區獲得較多補助款的情形在第五屆特別明顯與集中，在第六屆則較為分散，顯示在第六屆時，單一席次選區所獲得之資源有被複數席次選區瓜分的情形，這可能是因為選制改變對立委肉桶立法行為之影響，原本因集體行動邏輯而疏於輸送肉桶的複數席次選區立委，受到新選制來臨的影響，其中較有出線機會者，開始頻繁地爭取，並將肉桶輸送至新選

區，以求連任，因此，單一席次選區的肉桶資源會被想要連任之複數席次選區立委瓜分了。

表五 第五屆與第六屆立委期間各新選區人均補助款前十名

| 排名 | 第五屆 | 金額 | 第六屆 | 金額 |
|----|------------|--------------|------------|-------------|
| 1 | 連江縣 | 13033 | 連江縣 | 5763 |
| 2 | 金門縣 | 2257 | 苗栗縣 2 | 3901 |
| 3 | 澎湖縣 | 1885 | 金門縣 | 1886 |
| 4 | 台東縣 | 1329 | 澎湖縣 | 1402 |
| 5 | 嘉義縣 1 | 1310 | 高雄市 2 | 1355 |
| 6 | 花蓮縣 | 1069 | 嘉義縣 2 | 1017 |
| 7 | 宜蘭縣 | 964 | 高雄市 1 | 925 |
| 8 | 屏東縣 3 | 862 | 台東縣 | 861 |
| 9 | 彰化縣 2 | 751 | 桃園縣 2 | 814 |
| 10 | 嘉義縣 2 | 695 | 嘉義市 | 661 |

註：粗體字者為單一席次選區。此外，表內選區為新選制下的新選區，例如嘉義縣 1 代表新選區中的嘉義縣第一選區。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魅力城鄉主題網（2011）及作者自行整理。

(二) 統計分析結果

本研究迴歸分析結果列於下表六，首先，表六的第一個部分為模型一在第五屆及第六屆時之估計結果，結果顯示在控制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單一席次選區對於補助款的分配是沒有影響的。

本研究在後續的檢驗中，發現模型一的自變數中，代表單一席次選區之虛擬變數與選區個人選票集中度之相關係數高達 0.8 以

上，因此可能有共線性的問題，但若在模型一，只留下代表單一席次選區之虛擬變數，並排除選區個人選票集中度這變數時，單一席次選區的係數估計值仍然不顯著異於 0，因此本研究結果顯示單一席次選區並不會獲得較多的人均補助款。

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單一席次選區這個虛擬變數對補助款的影響並不顯著，但因單一席次選區之個人選票集中度較高，因此這類選區仍有可能獲得較多的人均補助款。這結果似乎顯示單一席次選區這樣的選制設計對於立委行爲的影響並不一定是顯著的，但在新選區劃分後，各新選區內政治勢力集中度的不同才是影響立委行爲的重要影響因素。

表六 第五屆與第六屆選區補助款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 自變數 | 模型一 | | 模型二 | |
|-----------|---------------------|--------------------|--------------------|--------------------|
| | 第五屆 | 第六屆 | 第五屆 | 第六屆 |
| 單一席次選區 | -1,383 (-1.64) | -752 (-1.25) | - - | - - |
| 選區個人選票集中度 | 10,661*** (3.94) | 1,796 (1.24) | 1,390 ** (2.07) | 2,250* (1.71) |
| 選區政黨選票集中度 | 8,997*** (4.65) | 8,157*** (6.33) | 477 (0.73) | 9,031*** (2.88) |
| 政黨版圖 | -116 (-0.43) | -137 (-0.85) | -101 * (-1.72) | -70 (-0.48) |
| 內政委員會資深度 | 20 (1.53) | 0.28 (0.03) | -5* (-1.17) | -9 (-0.38) |
| 選區立委資深度 | -751*** (-2.65) | 233 (1.50) | -76 (-1.81) | -59 (-1.23) |
| 縣市長黨籍 | 282 (1.03) | 239 (1.29) | -11 (-0.17) | 2 (0.01) |

| | | | | |
|---------------|-------------------|---------------------|--------------------|--------------------|
| 縣市自有財源比 | -20 (-1.80) | -17 ** (-2.36) | -30 (-1.08) | 0.17 (0.02) |
| 選區土地面積 | -0.22* (-1.49) | -0.10 (1.13) | -0.11*** (3.00) | -0.02 (-0.28) |
| 選區人口密度 | -0.01 (-0.75) | -0.003 (-0.34) | -0.004 (-1.22) | -0.11 (-1.10) |
| 常數項 | -3209 (-2.53) | -3752*** (-4.73) | 301 (0.80) | -4248 (-2.63)** |
| 樣本數 | 73 | 73 | 69 | 69 |
| Adj R -square | 0.7065 | 0.6110 | 0.5797 | 0.1834 |

註：括弧內為 t 值；* =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六的第二個部分顯示的是針對複數席次選區之模型二在第五屆及第六屆立委任期內的迴歸估計結果，模型二的估計結果顯示不論在第五屆及第六屆立委任期內，選區個人選票集中度對人均補助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顯示選票集中度越高的新選區，選民對選區立委課責性越強，因此立委肉桶立法動機越強，選區獲得較多之人均補助款，因此印證了本研究之假設二及假設三。

模型二之估計結果也顯示第六屆的個人選票集中度的估計係數值大於第五屆之估計值，顯示第六屆立委及政黨領袖的確有將肉桶多分到選票較集中的區域，也就是有個別立委明顯占優勢的新選區中，間接地證實本研究的假設四。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在第五屆立委任期中，以選區個人選票集中度為分配補助款之主要影響因素，政黨選票集中度則不具統計上之顯著效果；在第六屆立委任期中，則以選區政黨選票集中度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且具統計上顯著的效果，個人選票集中度雖有正

向的顯著效果，但其係數之估計值比較小。可能原因是，從 SNTV 選制改變為單一選區制後，政黨核心人士預期選民投票行為會由個人投票轉為政黨投票，因此，政黨選票集中度越高的選區，代表某一政黨在該選區較具優勢，未來也較有可能在該新選區獲勝，故政黨會將肉桶多分配到這些地區，以求在該新選區獲得勝。黃秀端（2001）比較臺灣省長、總統選舉（單一選區制）與立法委員選舉（SNTV 制），證實了在 SNTV 制度下，選民之策略性投票行為是在黨內候選人之間轉移，在單一選區制下，則是以政黨投票為主。王鼎銘等（2008）也以日本選制改革為研究對象，觀察其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他們發現選制改變為單一選區制之後，選民傾向政黨投票，因此，政治行為者在預期選民投票行為的改變下，會將肉桶由個人選票集中度高的地區轉移至政黨選票集中度高的地區，以提高當選的立委席次。

在其他控制變數方面，政黨版圖變數在模型二的第五屆達統計顯著且負向影響，在第六屆則無，這表示在第五屆時，若該選區是民進黨優勢選區，也會獲得較多之補助款，顯示該項補助款的分配主要掌握在行政部門，且民進黨政府有利用補助款回饋支持者、拉攏中間選民，以及排擠或懲罰國民黨支持者的現象。

立委資深度、縣市長黨籍、以及自有財源在兩屆模型中則未達到統計顯著。選區立委內政委員會中較資淺者獲得較多補助款，可能是資深立委在其選區已有穩固的票源，不需要再靠肉桶建立票源（羅清俊、廖健良，2009：34）。

此外，土地面積在第五屆的模型中，對補助款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代表土地面積越小者，獲得較多補助款。可能原因是土地面積小的選區大多為城市地區，在台灣因經濟快速發展下，城市地貌

相較於鄉村變化較迅速且劇烈，因而可能需要較多資源以改善其「髒、亂、醜」的地景形象（內政部營建署，2008）。

就模型二對依變數變異的解釋程度方面，第五屆調整後之判定係數（adjusted r-square）約為 0.58，比第六屆的 0.18 高出許多，顯示本文使用之實證模型較能解釋第五屆補助款的分配情形，對第六屆補助款分配情形的解釋力較低，這有可能是因為第六屆立委面臨新選制及新選區，有一些其他可能影響補助款分配的因素被本文忽視，例如第六屆立委可能也要回饋過去的支持者，但因此類變數太難衡量，因此造成本模型對第六屆立委之分配行為的解釋力較低。

本文實證了選舉制度改變前夕，立法委員肉桶行為已提前受到制度變革而有所改變，符合先前文獻的研究結論（羅清俊、廖健良，2009），而立法委員肉桶行為改變的依據則是選區政治勢力集中度的高低，肉桶有由單一席次選區遷移至複數席次選區的現象，在複數席次選區中，則是會將肉桶遷移至選票較集中的選區之趨勢。

六、結 論

研究結果發現，選舉制度及選區劃分的改變確實會影響補助款之分配，第六屆立委及國會中之政黨領袖在面臨新選制及新選區下，預期心理影響其肉桶行為，其中政治勢力集中度越高的新選區，代表選區選票結構越被寡占或獨占，也就是有某政黨或某立委明顯占優勢的新選區會獲得較多的補助款，本文也從資料分析中，證實了本文的後三個假設。

另外，在第六屆立委之分配行為中，政黨勢力集中度對補助款的影響力大增，甚至超越個人政治勢力集中度之影響力，這代表各

政黨在第六屆立委任期中，更加努力經營原本政黨佔優勢的新選區，顯示在選制改爲單一選區後，政治人物預期政黨對決將是立委選戰之主要面向，一般會利用補助款的分配，來鞏固政黨已經占優勢的地盤，而非以立委個人爲主的競選方式了。

參考書目

- Alvarez, R. Michael and Jason L. Saving. 1997. "Deficits, Democrats, and Distributive Benefits: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nd the Pork Barrel in the 1980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0, 4: 809-831.
- Ames, Barry. 1995. "Electoral Rules, Constituency Pressure, and Pork Barrel: Bases of Voting in the Brazilian Congres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7, 2: 324-343.
- Anagnoson, J. Theodore. 1980. "Politic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Federal Grants: The Cas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in Barry S. Rundquist. ed. *Political Benefits*: 547-561. MA: Lexington Books.
- Banks, Jeffrey S. and D. Roderick Kiewiet. 1989. "Explaining Patterns of Candidate Competition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4: 997-1015.
- Batto, Nathan. 2001. "Geographical Voting Bases and the Stability of Candidates' Voter Coalitions (1989-1998)."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8, 1: 211-251.
- Bickers, Kenneth N. and Robert M. Stein. 1996. "The Electoral Dynamics of the Federal Pork Barre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 4: 1300-1326.
- Cain, Bruce E. et al. 1979. "The House is Not a Home: British MPs in Their Constituencie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4, 4:

501-523.

- Carey, John M and Matthew Soberg Shugart. 1995. "Incentives to Cultivate a Personal Vote: A Rank Ordering of Electoral Formulas." *Electoral Studies* 14, 4: 417-439.
- Cox, Gary W. and Emerson Niou. 1994. "Seat Bonuses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for Large Parties: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26, 2: 221-236.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Engstrom, Erik J. and Georg Vanberg. 2010. "Assessing the Allocation of Pork: Evidence From Congressional Earmark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8, 6: 959-985.
- Fenno, Richard F. Jr. 1978. *Home Style: House Members in Their Districts*. Boston: Little, Brown.
- Fiorina, Morris P. 1981. "Some Problems in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3: 543-567.
- Heitshusen, Valerie et al. 2005. "Electoral Context and MP Constituency Focus in Australia, Canada, Ireland,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 1: 32-45.
- Hirano, Hiroshi. 2005 "National Issues and District Interests: Impact of the 1994 Electoral Reforms on Japanese Voting Behavior." *Proceeding of a Conference on 2005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4 September 2008.

Washington: Washington DC.

- Hirschman, Albert O. 1964. "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4, 5: 761-762.
- Kalseth, Jorid and Jørn Rattsø. 1998.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Administrative Spending: The Cas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Norwa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0, 1: 63-83.
- Lancaster, Thomas D. 1986. "Electoral Structures and Pork Barre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 1: 67-81.
- Lancaster, Thomas D. and W. David Patterson. 1990. "Comparative Pork Barrel Politics: Perceptions from the West German Bundestag."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2, 4: 458-477.
- Larcinese, Valention et al. 2006. "Allocating the U.S. Federal Budget to the States: The Impact of the President." *Journal of Politics* 68, 2: 447-456.
- Lazarus, Jeffrey. 2009. "Party, Electoral Vulnerability, and Earmarks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1, 3: 1050-1061.
- Lazarus, Jeffrey. 2010. "Giving the People What They Want? The Distribution of Earmarks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 2: 338-353.
- Lee, Frances E. 2003. "Geographical Politics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alition Building and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 4: 714-728.
- Lowi, Theodore J. 1964. "American Business, Public Policy, Case-Studies, and Political Theory." *World Politics* 16, 4:

677-715.

- Lowry, Robert C. and Matthew Potoski. 2004. "Organized Inter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Federal Discretionary Gra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6, 2: 513-533.
- McCurley, Carl and Jeffrey J. Mondak. 1995. "Inspected by #1184063113: The Influence of Incumbents' Competence and Integrity in U.S. House Ele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 4: 864-885.
- Mondak, Jeffrey J. 1995. "Competence, Integrity, and the Electoral Success of Congressional Incumbe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7, 4: 1043-1069.
- Plott, Charles R. 1968. "Some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 on Urban Renewal Deci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2: 306-321.
- Roberts, Brain E. 1990. "A Dead Senator Tells No Lies: Senior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ederal Benefi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1: 31-58.
- Rundquist, Barry S. and John A. Ferejohn. 1975. "Observations on a Distributive Theory of Policy Making: Two American Expenditure Programs Compared." in Craig Liske et al. eds. *Comparative Public Policy: Theories, Methods and Issues*: 87-108. New Jersey: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 Samuels, David J. 2002. "Pork Barreling is Not Credit Claiming or Advertizing: Campaign Finance and the Source of the Personal Vote in Brazil."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4, 3: 845-863.
- Scholl, Edward L. 1986.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 Constituency-Oriented Activity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0, 3: 315-332.
- Sheng, Shing-Yuan. 2006. “The Personal Vote-Seeking and the Initiation of Particularistic Benefit Bills in the Taiwanese Legislature.” *Proceeding of a Conference on Legislatures and Parliam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8 July 2006. Taipei: Soochow University.
- Stein, Robert M. and Kenneth N. Bickers. 1994.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nd the Pork Barrel.”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6, 2: 377-399.
- Stone, Walter J. and L. Sandy Maisel. 2003. “The Not-So-Simple Calculus of Winning: Potential U.S. House Candidates’ Nomination and General Election Prospec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5, 4: 951-977.
- Stratmann, Thomas and Martin Baur. 2002. “Plurality Rule, Propot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German Bundestag: How Incentives to Pork-Barrel Differ across Electoral Syste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 3: 506-514.
- Stroup, Michael D. 1998. “Some Evidence of Congressional Political in DOD Personnel Allocations.” *Public Choice* 94, 3: 241-254.
- Snyder, James M. JR. and Michiko Ueda. 2007. “Do Multimember Districts Lead to Free-Riding?”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32, 4: 649-679.
- 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2011。〈選舉資料庫〉。http://db.cec.gov.tw/。2011/6/30。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Offical Website. 2011.

“Election Statistics.” in <http://db.cec.gov.tw/>. Latest Update 30 June 2011.)

內政部戶政司。2011。〈門牌查詢系統〉。 <http://www.ris.gov.tw/36>。 2011/6/30 (Departmen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inistry of Interior. 2011. “Doorplate Search System.” in <http://www.ris.gov.tw/36>. Latest update 30 June 2011.)

內政部營建署。2008。《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第三期計畫核定本》。台北：內政部營建署。(Co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Interior. 2008. *The Third Stage Plan of Townscape Renaissance Projects*. Taipei: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Interior.)

內政部營建署魅力城鄉主題網。2011。〈歷年計畫一覽表〉。
http://trp.cpami.gov.tw/ch/Manage_List.aspx?path=204。 2011/6/30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Interior-Township Renaissance Project Official Website. 2011. “List of Projects.” in http://trp.cpami.gov.tw/ch/Manage_List.aspx?path=204. Latest update 30 June 2011.)

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2011。〈人民公僕〉。<http://www.kmt.org.tw/>。 2011/6/30。(Kuomintang Official Website. 2011. “Legislators.” in <http://www.kmt.org.tw/>. Latest Update 30 June 2011.)

民主進步黨全球資訊網。2011。〈Legislators〉。http://www.dpp.org.tw/news_content.php?menu_sn=7&sub_menu=43&sn=730。 2011/6/30。(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Official Website. 2011. “Legislators.” in http://www.dpp.org.tw/news_content.php?menu_sn=7&sub_menu=43&sn=730. Latest Update 30 June

2011.)

- 王鼎銘等。2008。〈選制轉變過程下杜佛傑心理效應之檢視：從日本眾議院選制變革的經驗來觀察〉。《問題與研究》47, 3: 1-28。
〈Wang, Ding-Ming et al. 2008. “Exploration of the Duverger's Psychological Effect on Electoral Transit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Electoral Reform in Japan.” *Issues and Studies* 47, 3: 1-28.〉
- 王靖興。2009。〈立法委員的立法問政與選區服務之分析：2000年政黨輪替前後的持續與變遷〉。《台灣政治學刊》13, 2: 113-169。
〈Wang, Ching-Hsing. 2009. “Analysis of Legislators' Law-Making and Constituency Service: Continuity and Change after Party Turnover in the Year 2000.”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3, 2: 113-169.〉
- 李俊達。2010。〈總統得票率、地方補助款與行程安排之相關性探討〉。《選舉研究》17, 2: 71-102。
〈Lee, Chun-Ta. 2010. “The Study on Relationships among Presidential Vote Rate, Local Grants, and Schedule Arrangement.”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7, 2: 71-102.〉
- 盛杏媛。2005。〈選區代表與集體代表：立法委員的代表角色〉。《東吳政治學報》21: 1-40。
〈Sheng, Shing-Yuan. 2005. “Constituency Representative and Collective Representative: The Representative Roles of Taiwanese Legislators.”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1-40.〉
- 盛杏媛。2010。〈選區、政黨與立法委員的三角關係：選制變遷前後的比較〉。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NSC 95-2414-H-004-046-MY3)。台北：行政院國家學委員會。
〈Sheng,

- Shing-Yuan. 2010. "The Triangle among Constituency, Party and Legislators: A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hange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Research Project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95- 2414-H-004-046-MY3.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 盛治仁。2006。〈單一選區兩票制對未來台灣政黨政治發展之可能影響探討〉。《台灣民主季刊》3, 2: 63-86。 (Sheng, Emile C.J. 2006. "A Discussion of the Potential Influences of a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 on Taiwanese Partisan Politics."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3, 2: 63-86.)
- 黃秀端。1994。《選區服務：立法委員心目中連任之基礎》。台北：唐山出版社。 (Huang, Shioh-Duan. 1994. *Constituency Services: The Foundation of Legislature Reelection*. Taipei: TanSan, Inc.)
- 黃秀端。2001。〈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策略投票〉。《東吳政治學報》13: 37-75。 (Huang, Shioh-Duan. 2001. "A Comparison of Voters' Strategic Voting in Single Member and Multiple Member Districts Plurality System."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3: 37-75.)
- 黃紀、林怡均。2009。〈執政黨資源分配的邏輯：2001~2008 年的補助款分析〉。《2009 年台灣政治學會》。2009 年 11 月 22 日。新竹市：台灣政治學會、玄奘大學。 (Huang, Chi and Yi-Jiun Lin. 2009. "The Logic of Resource Distribu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on The 2009 Annual Meeting of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2 November 2009. Hsinchu City: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d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 楊濡嘉。2007。〈立委選舉逼近 城鄉風貌補助淪為綁樁小金庫〉。
《聯合報》。2007/10/12：A16。 (Yang, Ru-Chia. 2007.
“Townscape Renaissance Project Grants Become the Small
Treasuries of Incubent Legislators as Legislative Election
Approaches.” *United Daily News* 12 October 2007, late ed.: A16)
- 羅清俊。2000a。〈政策利益分配的型態：最小獲勝聯盟？還是通通
有獎？〉。《政治科學論叢》13：201-232。 (Luor, Ching-Jyuhn.
2000a. “The Pattern of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Policy Benefit:
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 or Universalism?”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3: 201-232.)
- 羅清俊。2000b。〈猜猜看誰把醃肉帶回家了：縣市補助款分配之分析〉。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2, 1：1-45。 (Luor, Ching-Jyuhn.
2000b. “Guess Who Brings Home the Bacon: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aiwan Provincial Grant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12, 1: 1-45.)
- 羅清俊。2008。〈小規模立法委員選區的分配政治—選民對於補助
利益的期待〉。《臺灣民主季刊》5, 4：47-85。 (Luor, Ching-Jyuhn.
2008. “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Small Districts under the SNTV
System in Taiwan: The Expectation of Constituencies on Pork
Barrel.”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5, 4: 47-85.)
- 羅清俊。2009。《重新檢視台灣分配政策與政治》。台北：揚智文
化。 (Luor, Ching-Jyuhn. 2009. *Reexamining Distributive Policy
and Politics in Taiwan*. Taipei: Yang Chih, Inc.)
- 羅清俊、萬榮水。1999。〈選舉與補助款的分配：綁樁？還是平衡
地方財政？〉。《選舉研究》6, 2：121-161。 (Luor, Ching-Jyuhn

and Ron S. Wahn. 1999. "Elections an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Grants: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r Equalizing Local Finance."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6, 2: 121-161.)

羅清俊、廖健良。2009。〈選制改變前選區規模對立委分配政策提案行爲的影響〉。《台灣政治學刊》13, 1: 3-53。〈Luor, Ching-Jyuhn and Chien-Liang Liao. 2009. "The Impact of District Size on Bill Initiation Behavior of Pork Barrel: An Analysis of the 5th and 6th Legislative Yuan in Taiwan."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3, 1: 3-53.〉

羅清俊、謝瑩蒔。2008。〈選區規模與立法委員分配政策提案關聯性的研究：第三、四屆立法院的分析〉。《行政暨政策學報》46: 1-48。〈Luor, Ching-Jyuhn and Ying-Shih Hsieh. 2008. "The Association of District Size and Pork Barrel Related Bills Initiated by Legislators: An Analysis on the 3rd and 4th Legislative Yuan in Taiw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46: 1-48.〉

蘇彩足。2001。〈省政府補助款之政治因素分析〉。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89- 2414-H-002-026)。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Su, Tsai-Tsu. 2001. "The Political Determina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Grants of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Research Project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89- 2414-H-002-026. Taipei: Nation Science Council.〉

The Impact of Legislative Electoral System Changes on Earmarks Distribution: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Fifth and the Sixth Legislative Yuan in Taiwan

Ying-Chieh Lai* Hongwung Wang**

Taiwan's new single-district, two vote legislative electoral system replaced the SNTV in 2005, and was first followed in the 7th legislative election in 2008. Based on distributive policy theory,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how 6th Yuan's legislators and party leaders changed their pork barrel behaviors in order to maximize re-election probabilities and seats when facing the coming electoral rule changes.

By analyzing the "Creating Townscape Renaissance Project" data during the 5th and 6th legislative terms, this study has two major findings. Fir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re concentrated the legislators' personal votes in an electoral district is, the more earmarks it gets. This may be because that when the legislators' votes in an electoral district are more concentrated, there exists a dominant representative, who has greater accountability to voters. As a result, the representative has a stronger motivation to bring the pork home. The results

* Officer, Civil Service Ethics Offi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of Tainan City Government, Master of Arts in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lso show that when other things hold constant, legislators' personal vote concentration had more positive impacts on grants in the 6th legislative term than in 5th term.

In addition, a party's political power in an electoral district shows much more positive impacts on earmarks distribution in 6th term. This may be because the party competition is anticipated to be the major issue in new electoral system, and thus earmarks were distributed based on a party's dominance.

Keywords: distributive policy, earmarks, legislative electoral system changes, townscape renaissance project, Herfindahl index